

---

# 村干部身份与灾后社会救助的实证研究<sup>1</sup>

叶昱利，朱文，李强

**【摘要】**：本文研究5·12汶川地震后，在地震所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情况和农户家庭情况等均相同条件下，村干部家庭相对于普通受灾家庭是否获得更多数量（金额）的社会救助。利用汶川地震灾区农户基本情况调查数据，我们发现村干部家庭只比普通群众家庭平均多获得一点食品救助，而村干部家庭在货币资金、衣物、帐篷、永久性住房援助、医疗等方面与普通群众家庭并没有显著差异。我们还发现地震所造成的损失增加，将显著增加农户获得货币资金救助及其它社会救助的金额。

**【关键词】**：汶川地震，社会救助，村干部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2018）-06-0116（07）

## 一、引言

我国近年来地震灾害发生较为频繁，其中2008年汶川8.0级、2010年玉树7.1级、2013年芦山7.0级地震最为人们所熟知。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震后，我国投入了大量救灾物资。以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为例，据审计署关于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资金物资审计情况公告（第4号），至2008年11月底中央、地方各级财政和社会各界共安排抗震救灾资金2025亿元，用于救灾支出729亿元。<sup>①</sup>类似这样的抗震救灾资金我们常常称之为社会救助。所谓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体对于遭受自然灾害、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其他低收入公民给予物质帮助或精神救助，以维持其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的各种措施。

由于地震是目前尚不能预测的自然灾害，其发生常常较为突然，灾后社会救助常常带有应急的特征，故社会救助资源的投向难免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与此同时，震后交通、通信中断，造成信息难于传播，故社会救助透明度可能较低，且缺乏有效监督机制。<sup>①②</sup>因此，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是，地震后谁最可能获得这些社会救助？村干部是否可能获得更多救助？在社会救助透明度比较低、监督较为缺乏的情况下，地震后村干部家庭在获得社会救助方面相对于普通农户家庭可能具有一定的优势。从另一角度来看，地震也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震撼，让人们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使得人们在灾后更加相互关心、爱护、帮助、同情，村干部也更能深刻地体会到其社会责任。因此，村干部获得社会救助的数量或金额将可能比普通受灾家庭更少。于是，村干部家庭究竟是否可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救助取决于正负两种作用孰大孰小，即这是一个有待检验的实证问题。探讨村干部是否获得更多的社会救助，是涉及到社会救助工作是否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时原则的问题，将对于理解灾后社会救助资源如何分配，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以及为将来开展更加有效的灾后救助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含义。

---

<sup>1</sup>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优秀学生培养工程项目“宗教信仰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编号：2018YXXS1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环境污染相互作用的机理与实证研究”（编号：15AZD07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朱文为本文通讯作者。

**【作者简介】**：叶昱利，硕士研究生，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0041；朱文，教授，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四川成都610041；李强，副教授，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sup>②</sup>①其中，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安排抗震救灾资金1287.36亿元；18个中央部门单位、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接受救灾捐赠款物640.91亿元；“特殊党费”97.3亿元。中央及地方各级财政支出480.17亿元，中央各部门各省市支出231.76亿元，特殊党费17.41亿元。详见：<http://www.audit.gov.cn/n1057/n1072/n1282/1727814.htm>。

尽管研究灾后社会救助资源如何分配的意义不言而喻，目前却鲜有文献研究。已有的文献主要研究地震对于我国经济（包括股票市场）的影响；<sup>[3]</sup>地震对于灾民心理的影响；<sup>[4~6]</sup>震后企业的捐款动机；<sup>[7][8]</sup>震后医疗救助；<sup>[9]</sup>震后救助公平感。<sup>[10][11]</sup>与本文较为接近的文献是研究灾后重建资金投向的影响因素，<sup>[12]</sup>他们使用统计性描述发现贫困村灾后重建资金投向与受灾程度、自然条件、产业基础、传统文化、农户意愿等多种因素相关。然而，由于村干部常常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的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对于村干部如何影响社会救助资源的利用知之甚少，本文试图在该方面做出有益的尝试。

本文利用 5·12 汶川大地震灾区农户基本情况调查数据，运用 OLS 模型回归发现村干部在地震后获得食品救助的金额显著地大于普通群众家庭。具体地，在其它情况均相同的条件下，村干部家庭比普通群众家庭平均多获得 402 元食品救助。但是，村干部在获得货币资金、衣物、帐篷、永久性住房援助、医疗等方面与普通群众家庭并没有显著差异。其次，我们发现生活物品损失以及房屋财产损失越大，将显著增加农户获得货币资金救助及其它社会救助的金额。

综上所述，本文有如下贡献。首先，本文首次研究震后社会救助资源的分配。由于目前鲜有文献研究类似问题，本文的研究有望在此领域做出一定开创性的尝试；其次，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可为国家将来制定有效的灾后社会救助政策提供借鉴，以便能更为高效地开展灾后救助工作；最后，我们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发生较为频繁的国家，灾害不仅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还影响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自然灾害发生后的社会救助往往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本文的发现为更加有效地开展社会救助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撑，有助于降低受灾家庭因灾返贫、致贫的风险，维护社会稳定。

## 二、模型

本文主要研究 2008 年 5·12 汶川大地震后，在地震所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情况和农户家庭情况等均相同条件下，村干部家庭相对于普通受灾家庭是否获得更多数量或金额的社会救助。灾后社会救助包括了许多方面的内容，例如，货币资金、食品、衣物、衣物、帐篷、永久性住房援助和医疗及药品，等等。在特定的环境中 and 特定的时间内，这些救助物资的稀缺程度和受灾家庭对救助物资的需求是不同的。例如，地震刚刚发生后，如果灾区与外面的交通、通信中断，食品或许是最为紧缺的生活必需品；食品问题解决之后，供临时住宿的帐篷可能比食品更为紧缺；交通、通信恢复后，进入灾后重建时期，货币资金等可能相对于食品更为紧缺。因此，社会救助物资在某一特定环境中 and 某一特定的时间内，在村干部与普通受灾群众间的分配结果，可能与受灾地区所面临的资源紧缺程度以及救援物资是否是必需品等因素相关。于是，我们有必要区别每一类社会救助，研究村干部家庭获得该项救助的数量或金额是否与普通受灾家庭有什么不同。

为了验证村干部家庭是否获得更多的社会救助这一实证问题，我们使用 OLS 模型来估计家庭中任何成员为村干部对于获得货币资金金额，衣、食、住等社会救助的影响。本文将模型设定如下：

$$Y_i = \alpha + \beta \text{cadres}_i + X_i' \gamma + Z_i' \delta + \epsilon_i \quad (1)$$

其中  $Y$  是受灾农户所获得的社会救助，包括货币资金的金额、食品、衣服、住房（帐篷（顶）、永久性住房援助）以及医疗和药品等方面的情况（除帐篷的单位为顶外，其它社会救助的单位均为元）。如果受灾农户的户主或家庭内任何成员为村干部（组长、村主任或书记）， $\text{Cadres}=1$ ，否则为 0。 $X$  是关于受灾情况的控制变量，包括地震所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Z$  是农户户主的个人特征，例如，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在这样模型设定中， $\beta$  衡量了在其它情况均相同条件下，村干部家庭相对于普通受灾家庭获得资金金额及衣食住等方面是否具有优势。如果  $\beta > 0$ ，则意味着村干部家庭相对普通受灾家庭可以获得更多数量或金额的社会救助。本文对村干部相对于普通受灾家庭在各项社会救助数量或金额上是否存在显著不同的识别来源于村内和村与村之间村干部数量的变化。

我们对上述各类社会救助金额或数量分别回归，以观察地震后在面临紧缺的必需品时，我们的估计结果是否有所不同。根

据上文中的讨论，我们预计村干部在获得食品、衣物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其原因是地震后一段时间内该类资源应该最为紧缺且该类资源也是生活必需品；村干部在获得货币资金救助方面可能与普通受灾家庭没有显著的差别，其原因可能是货币资金救助开展于灾后重建期间，在此期间信息比较充分，监督可能更为到位。

模型（1）中我们最主要关心的变量，村干部（Cadres）应该是外生的。这是因为地震是目前尚不能预测的自然灾害，则地震前村干部不太可能因为预测到即将发生地震而选择当选为村干部以便为地震后获得更多的社会救助，即我们可以排除获得社会救助数量与是否是村干部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并且自然灾害对所有村民的影响都应该是一样的，不应该存在因为是村干部则其受灾影响会较轻的情况，所以村干部这一变量与随机误差项也不相关。因此，地震灾害这样的自然实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通过使用 OLS 模型识别在自然灾害面前是否是村干部对获得社会救助数量或金额的因果影响。

### 三、数据及统计性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项目“汶川地震灾区农户基本情况调查”。随机抽样调查了四川、甘肃两省共 5 个地级市、9 个县级市 24 个镇 48 个村庄，共获得 731 户有效问卷。该调查分别于 2009 年 12 月、2010 年 8 月、2011 年 1 月收集了汶川地震影响区域内农户的个人特征、地震所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方面的损失、受到的社会救助、资金使用、农业生产、土地流传等方面的信息。其中受灾情况和获得社会救助情况是我们最为关心的两部分。该调查将受灾情况分为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两个部分；将社会救助细分为货币资金、食品（包括水、饼干、粮油、面粉、肉类等，以下简称为食品）、衣物、住房（包括帐篷和永久性住房）、医疗及药品等具体项目。

表 1 报告的是本文所使用数据的统计性描述。根据研究主题，本文将农户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群众家庭，即家中没有任何人担当过组长、村主任或书记以上干部职务的家庭（简记为普通群众家庭，下同）；另一类是家庭中有任何一人担当过组长、村主任或书记以上干部职务的家庭（简记为村干部家庭，下同），并通过统计性描述比较这两种类别农户家庭的受灾情况和接受社会救助的情况。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出普通群众家庭平均有 0.05 人受伤，而村干部家庭中平均有 0.11 人受伤，但两者的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普通群众家庭中平均有 0.01 人在地震中死亡，而村干部家庭中有 0.05 人在地震中死亡，且两者的差异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我们发现因地震引发的伤亡而给家庭带来的直接医药费损失（直接损失）以及劳动力丧失而带来的间接损失在两类家庭中并没有显著的不同。我们将农户的房屋、畜禽、农作物、生产资料等方面的损失加总，定义为家庭财产总损失。<sup>②</sup>其结果发现，两类农户在家庭财产总损失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家庭户主的个人特征方面，98.5% 的村干部家庭的户主是男性，该比率显著高于普通群众家庭相应的比率。给定假设村干部的能力较高，这一现象应该是合理的。我们还发现 93% 的普通家庭户主是汉族，而只有 80% 的村干部家庭的户主是汉族。

表 1 农户受灾情况及接受社会救助情况统计性描述

	普通群众家庭		村干部家庭		(1) ~ (3)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受伤	0.0556	(0.236)	0.108	(0.359)	-0.0520
死亡	0.00902	(0.0946)	0.0462	(0.211)	-0.037***
直接损失（元）	223.8	(2617.2)	363.1	(1717.5)	-139.3
间接损失（元）	268.6	(4112.2)	123.1	(992.3)	145.5
家庭财产总损失（元）	47553	(57631.5)	72382.8	(99990.1)	-24829.8

<sup>②</sup>直接损失是指因地震引发的伤亡而给家庭带来的直接医药费（元），间接损失是指地震伤亡引发劳动力丧失而损失的年收入（元）。家庭财产总损失是农户的房屋、畜禽、农作物、生产资料等方面的损失的加总。如无特别说明，金额单位为元。

户主男性 (=1)	0.887	(0.317)	0.985	(0.124)	-0.097**
户主年龄	50.39	(11.24)	49	(9.713)	1.391
户主汉族	0.931	(0.254)	0.8	(0.403)	0.131***
货币资金 (元)	29757.6	(29543.1)	27911.2	(18349.1)	1846.338
食品救助 (元)	965.9	(1445.7)	1645.1	(2527.2)	-679.255***
衣物救助 (元)	220.3	(641.5)	388.5	(711.4)	-168.209**
帐篷 (顶)	0.535	(0.608)	0.6	(0.581)	-0.065
永久性住房援助 (元)	7302.7	(16105.2)	6230.8	(15134.6)	1071.942
医疗及药品 (元)	242.8	(4797.3)	18.31	(62.71)	224.519
总救助 (元)	31227.6	(27143.4)	31637.8	(23098.9)	-410.17
样本量	665		65		

数据来源：作者调查；括号里是标准差。

在接受社会救助方面，村干部家庭接受到的食品金额、衣物金额虽然大于普通群众家庭，但在接受到的货币资金（元）、帐篷（顶）、住房援助（元）、医疗及药品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在地震发生后的较短时间内，村干部接受到食品略多，可能与承担的任务十分繁重有关。灾后村干部承担村民的安置、组织抢救伤员、收集情况、发放救灾物质等工作，日夜加班，劳动消耗大，相应对食品需求大。虽然村干部获得较多的食品救助，但若比较将所有社会救助加总后得到的总救助金额，村干部家庭与普通群众家庭并没有显著的区别，这说明村干部与普通群众家庭相比，并没有利用干部身份之便多占救助资金。

#### 四、回归结果

表 2 报告了 OLS 回归结果。第一列本文对货币资金救助金额（元）回归。我们发现，在其它情况均相同条件下，是否是村干部对于获得货币资金救助的金额没有显著影响，其符号甚至为负，但并不显著区别于 0。另外，我们发现，生活物品损失以及房屋财产损失越大，将显著增加农户获得货币资金救助的金额。具体地，生活物品损失每增加 10%，得到货币资金救助的金额将增加 71 元；房屋财产受损每增加 1%，得到货币资金救助的金额将增加 157 元。我们并没有发现户主的个人特征对获得货币资金救助金额有显著影响。

表 2 汶川地震后村干部获得社会救助资源情况

	(1)	(2)	(3)	(4)	(5)	(6)
	货币资金救助	食品救助	衣物救助	帐篷	永久性住房援助	医疗及药品
村干部	-4796.1 (3839.77)	401.7** (203.47)	69.15 (86.09)	-0.0360 (0.08)	-1758.3 (2097.94)	-488.2 (619.40)
户主男性	-4374.3 (3507.59)	27.64 (185.86)	-18.76 (78.64)	0.0684 (0.07)	-1289.7 (1916.47)	333.5 (565.82)
户主年龄	12.32 (105.70)	7.050 (5.60)	-1.077 (2.37)	0.00250 (0.00)	-29.64 (57.77)	-26.41 (17.05)
户主汉族	-1787.8 (3932.44)	-1905.4*** (208.38)	-482.5*** (88.17)	-0.247*** (0.08)	9004.3*** (2148.48)	263.8 (634.35)
伤亡	10834.0** (4216.57)	88.68 (223.43)	93.05 (94.54)	0.205** (0.09)	2789.2 (2303.81)	3218.6*** (680.18)
生活物品损失 (对数)	712.3*** (254.81)	-27.63** (13.50)	14.50** (5.71)	0.0256*** (0.01)	773.1*** (139.24)	37.51 (41.10)

房屋损失（对数）	1568.5*** (396.59)	48.76** (21.02)	7.274 (8.89)	0.0232*** (0.01)	624.5*** (216.68)	1.822 (63.98)
户主教育程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30	730	730	730	730	730
adj. R <sup>2</sup>	0.045	0.117	0.062	0.063	0.084	0.023

注：括号内是标准差。控制变量伤亡是一个虚拟变量，在报告有伤亡时等于 1，否则为 0。\*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比较有趣的是第二列的回归结果。本文发现，村干部获得食品救助的金额要大于普通群众家庭。具体地，在其它情况均相同的条件下，村干部家庭平均比普通群众家庭多获得 402 元食品救助。与第一列不同的是，我们发现汉族户主相对于其它少数民族而言，将少获得 1905 元的食品救助；与第一列相同的是，房屋损失越大，获得食品救助金额也越大。本文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虽然与之前文献的发现相同。如，马缨认为农村集体对养老保险保费的补贴中，一般是补贴干部不补贴群众；在干部和群众均有集体补贴的村，也是干部补得多、群众补得少。但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地震后的社会救助，村干部仅在获得食品救助方面略多一点，在其它诸如货币资金等方面并没有优势。已有研究发现电视、村干部、广播、报纸是受灾群众了解救灾政策最为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截至 2008 年 7 月 19 日仍有 13.3% 的灾区居民不能收看电视，58.5% 的灾区居民不能收听广播，68.1% 的灾区居民看不上报纸。这可以说明地震后一段时间内灾区居民获取救灾政策信息可能主要来源于村干部。

第三列报告对衣物救助的回归结果。本文发现，是否是村干部对于接受救助的衣物金额没有显著的影响。村干部的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区别于 0。户主是汉族相对于户主是少数民族的家庭仍然将少获得 483 元衣物救助。与第一列的回归结果相同，生活物品损失越大仍然与获得衣物救助的金额正相关。

第四、五、六列分别报告对帐篷（顶）、永久性住房援助（元）医疗及药品（元）的回归结果。本文发现，是否是村干部在其它情况均相同条件下对获得帐篷、永久性住房、医疗及药品的救助没有显著的影响。其它控制变量的符号与第一列大致相同，并符合预期。

综合来看，本文发现村干部家庭相对于普通群众家庭仅在获得食品救助这一资源上占有多一点，但在其它方面与普通群众家庭没有显著的区别。村干部获得的食品救助比普通群众多一些，并不说明村干部在主观上试图想多拿一点，而是当时特殊时间里的客观结果。在受灾后的较短时间里，作为村干部，承担着十分繁重的救灾安抚群众工作，相应地的劳动消耗强度大，对水和食品的需求量大。抗震救灾后期的较大规模的货币资金救助和住房救助是否为村干部在获得货币资金救助方面相对于普通群众家庭并不占有优势。这说明，村干部在获得救助方面能够按照规定执行，多占现象并不突出。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村干部在获得医药救助方面与普通群众也没有显著差异。如果地震后灾区伤亡较为严重，而缺医少药又普遍存在时，则村干部获得更多的医疗救助似乎更符合预期推理。但我们的回归结果并不支持这一假设，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一点可以从我们的统计数据中寻找答案。本文所使用的 730 户样本中，共有 6.71%（49 户）的家庭报告有伤亡情况，即在我们的样本中，地震造成伤亡情况并不十分严重。这可能与本文的样本有关。本文中地震所在地汶川的样本只有 3 个村庄，占 10.4%，则我们的样本可能低估了地震所造成伤亡的严重程度。

## 五、讨论与总结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发生较为频繁的国家，灾害不仅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还影响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自然灾害发生后的社会救助往往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国家在自然灾害的发生后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社会救助功能。但是，目前鲜有文献研究国家在自然灾害时应该如何有效的开展社会救助工作。本文主要研究 2008 年“5·12”汶川大地震后，在其它情况均相同条件下，村干部家庭相对于普通群众家庭是否会获得更多数量或金额的社会救助。本文利用“汶川地

---

震灾区农户基本情况调查”数据，运用 OLS 回归模型发现村干部获得食品救助金额仅大于普通群众家庭。具体地，在其它情况均相同的条件下，村干部家庭平均仅比普通群众家庭多获得 402 元食品救助。但是，村干部在货币资金、衣物、帐篷、永久性住房援助、医疗等方面与普通群众家庭并没有显著差异。村干部在食品救助资源分配中多占有一些可能与村干部在灾后的劳动消耗强度大有关。其次，我们发现生活物品损失以及房屋财产损失越大，将显著增加农户获得货币资金救助及其它社会救助的金额。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国家和地方政府了解村干部在大灾面前的表现，更好地运用社会救助资源，最大化救助资源的利用效率，将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社会公平，并为将来更为有效的开展灾后救助提供可靠的实证支撑。

**[参考文献]:**

- [1]莫汀.完善中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浅析[J].四川劳动保障,2011,(06).
- [2]马静,朱德云.关于我国农村社会救助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2,(04).
- [3]山立威.心理还是实质:汶川地震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04).
- [3]陈丽.关于构建地震灾后心理救助综合体系的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2009,(04).
- [4]Liu C, Ke X, Li N. Social support and Quality of Life :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n survivors eight months after the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J]. BMC Public Health, 2010, (01).
- [5]Kun P, Chen X, Han S, et al .Prevalence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after the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J].Public Health, 2009, (11).
- [6]山立威,甘翠,郑涛.公司捐款与经济动机——汶川地震后中国上市公司捐款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8,(11).
- [7]卢现祥,李晓敏.企业捐赠、社会责任与经济动机——基于“5·12地震”后世界500强公司捐赠情况的实证研究[J].经济纵横,2010,(01).
- [8]李晓阳,王雅林.特大地震医疗救助管理的对策及措施[C].中国软科学年会,2009.
- [9]张欢,任婧玲.灾后救助政策公平感的测量——基于玉树地震灾区的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6).
- [10]张欢,任婧玲,刘倩.析灾后救助政策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基于汶川地震的实证研究[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03).
- [11]庄天慧,陈秀兰,傅新红.贫困村灾后重建资金投向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四川为例[J].农村经济,2011,(02).
- [12]刘书鹤.农村社会保障的若干问题[J].人口研究,2001,(05).
- [13]马缨,邓大胜,王奋宇,何光喜,赵延东.汶川地震灾区居民的生活状况与政策需求调查报告[A].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

---

分析与预测[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